



威廉·燕卜苏

1937年11月初的一个夜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文学院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走进简陋的教室,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学们,我们所请的英国剑桥诗人已经来南岳了,他现在正在楼上打字,明天就可以给大家上课了。嘿,他可真是一位了不得的诗人呢!”

这位“了不得的诗人”就是威廉·燕卜苏(William Empson),1906年9月27日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1925年,他考入剑桥大学玛德琳学院念数学,两年后在数学学位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开始以剧作家和诗人的身份被人所知。之后,他由数学专业转读文学专业,获得文学学位考试荣誉第一名。他师从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家I.A.瑞恰慈,于1930年写出了震惊现代西方文学界且影响久远的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该书改变了整个现代诗的历史,也开创了“细读”(Close Reading)批评范式,一直到今天,英美大学的文学系依然鼓励学生作细读分析。美国文学批评家兰色姆认为:“没有一个批评家读此书后还能依然故我。”有人甚至说,西方文学应分成“前燕卜苏(Pre-Empsonian)时期”和“后燕卜苏(Post-Empsonian)时期”。

燕卜苏年方24岁,已经是闻名英国的剑桥才子,剑桥文学社刊物《Granta》的台柱子,前途可谓光芒万丈。但好景不长,据说剑桥校方因为在燕卜苏抽屉里发现了避孕套,因而取消了他的教席。在瑞恰慈的帮助下,他远赴日本任东京文理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后来接受北京大学的聘请,于1937年春天来到中国。他先是随当时在中国推广“基本英语”的瑞恰慈夫妇乘船去了香港,随后到中国内地走马观花。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搬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长先后为张伯苓和梅贻琦。因校舍不够,临大文学院就设在南岳衡山白龙潭上头的圣经学校里,所以《西南联大校歌》中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当时,文学院院长是胡适先生,但实际并未到任。燕卜苏辗转来南岳报到,在此工作、生

■讲述

威廉·燕卜苏的南岳之秋

□甘建华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活3个多月,播撒了现代派诗歌的种子,并写下了234行的长诗《南岳之秋》(Autumn In Nanyue),非常具体地描绘了他们当时所处的困境,展示了师生们刚毅坚卓、勤奋向学的精神风貌。

校方安排燕卜苏为学生讲授莎士比亚和英国诗歌。著名学者、比较文学专家赵瑞蕻在《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苏先生》中,记述了燕卜苏第一天上课时的情形:“燕卜苏先生一进教室门,便开口急急忙忙地说话。一说话,便抓了粉笔往黑板上急急忙忙地写;然后擦了又写,又抬头望着天花板‘喔,喔……’地嚷着,弄得大家在静穆的氛围里迸出欢笑火花。那天他给我们大略讲述了有关莎士比亚评论一类的近况。然而,他的话说得又快又不很清楚,一口纯正的牛津音,也许我们没有习惯,不过听起来挺悦耳。在那一节课程里,与其说去听课,不如说来欣赏这位英国现代派名诗人的风采和谈吐,大伙儿的眼光迷失在诗人的身上了。”

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图书还没有运到南岳,燕卜苏便是凭借超凡的记忆,把《奥赛罗》整段整段地默写在黑板上,或把乔叟和斯宾塞的诗篇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然后边讲解边评论。这在《南岳之秋》中有所反映:

课堂上所讲的一切题目与内容,

都埋在丢在北方的图书馆里。

因此人们奇怪地困惑,

为找线索,搜寻自己的记忆。

多年后,赵瑞蕻回忆起这段往事,尚有一种仿若隔世之感。他说:“战事恫惶之中,上燕卜苏的课,让人恍然觉得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儒士背诵整部经书授徒。”

燕卜苏在讲授《当代英诗》课时,从霍普金斯(Hopkins)一直讲到奥登(W.H.Auden),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他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不像一些学院派大师那样溯源流、论影响,也几乎完全不征引任何二手的批评见解,他喜欢独立对诗歌的语言进行精细分析。他认为T.S.艾略特对庞德的推崇超过了正当的评价,实属过誉。他对于艾略特的后期诗作《四个四重奏》评价不高,认为失之于空洞,这与一般美国批评家将该诗捧到天上的做法大相径庭。他对自己的成就

总是抱着谦逊的态度,说自己的文学批评范围过于狭窄,远远不及他最钦佩的英国莎士比亚批评家A.C.布拉德雷。他认为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一书,在卷帙浩繁的莎士比亚评论中是惟一值得一读的著作。他还鼓励学生对诗歌要有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不要人云亦云,甚至有时要提出与教师不同的看法。诗人《南岳之秋》译者王佐良说:“他这样做的结果,就逼迫我们不得不集中精力阅读原诗。许多诗歌很不好懂,但是认真阅读原诗,而且是在那样一位知内情、有慧眼的向导的指引之下,总使学生们对于英国现代派诗和现代派诗人所推崇的17世纪英国诗剧和玄学派诗等等有了新的熟悉。”“他也是现代诗人中惟一提出诗人应该给自己的诗作注以助于读者理解的人”。

燕卜苏在临大文学院课堂上讲的理论学生们不一定都懂,却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学生们常常在他的课前上演抢位子的喜剧。年轻学子求知若渴,加上一些对“异域诗人气质”的崇拜,燕卜苏的人气自然很旺。英语教育家、语言学家许国璋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秋和1938年春,在南岳他同我们一起研读过的那些伟大诗篇。读着美妙的诗篇,诗人燕卜苏替代了先生燕卜苏,随着朗读升华为背诵,词句犹如从诗魔口中不断地涌出,大家停下了手中的笔记,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诗泉,这时,学生、先生共同沉醉于莎翁精神之中。是的,这样神为之驰的场面确实存在过。”

《南岳之秋》抒写的是“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的经验,燕卜苏在诗中说他交了一批好朋友。诗中是这样写的:

那些珀伽索斯应该培养,

就看谁中你的心意。

版本的异同不妨讨论,

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

珀伽索斯(Pegasus)是希腊神话中的双翼飞马,马足踏过的地方就会泉水迸涌,诗人饮后能够获得灵感。燕卜苏用在这里,特指那些朝夕共处的富有文学才华的青年学生。在重重大山深处,在莘莘学子心中,“一个出现在中国校园中的英国现代诗人,本身就是任何书本所不能代替的影响”。这些学生中,有穆旦、王佐良、许国璋、杨周翰、袁可嘉、杜运燮、郑敏、李赋宁、周珏良、金堤、赵瑞蕻等。他们日后成为中国英美文学教授和英语教学专家,这些学生的确配得上燕卜苏诗中“珀伽索斯”的赞誉。

临大文学院距南岳镇四五里,原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营房,后来成为美国人办的圣经学校。校舍为两层木结构建筑,十分陈旧破败,底层潮湿,排满双层大床,光线暗淡,学生睡地板。下雨后,多处漏水,只好在被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睡到天亮。年轻学子们就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内心燃烧着初始接触西方现代派文学时青年人那种特有的兴奋和沉迷。当时中国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如今他们跟着燕卜苏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诗,又读狄伦·托马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界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周珏良回忆道:“我们从燕卜苏先生处借到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爱克苏尔的城堡》和艾略特的文集《圣木》(The Sa-

■行走

在仙岩和曹村流连

□董恒波



仙岩风景

如此高誉的才子并不多。由此看来,仙岩因为有了“陈傅良书院学风”的传承,足以在中国的南方构成自己一道独特的风景。

仙岩的美,还美在友情。

在仙岩,无论是官员,还是作家朋友,抑或是僧人及百姓,他们都会用慈爱的目光向你展现心中的善良。我们正在仙岩寺里参观的时候,突然天降细雨,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女僧用小跑的速度给大家取来了雨伞,——为人们打开。诸多细节,让我们看到的是仙岩美的背后,其实是爱。

自然的美丽、文化的厚重,佛光的闪耀,这多种元素叠加在一起,让我们每一个走进仙岩的人,都会为仙岩所折服。在仙岩的时候,即使我们没有走进那不远处的慧光宝塔,我们也会站在它的身旁,虔诚地向它行注目礼。

我们向文化致敬,向美丽的自然致敬,也向友善的仙岩人致敬。

在仙岩的时光很短,就是在这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与同行的文友们,一起唱着优美的歌,朗诵着诗词,说不尽心中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这一切都是自然流露的,都源于我们内心的感动。

有机会我还会来仙岩的。我要把仙岩的印象告诉更多的朋友们——在南国那片美丽的地方,有一处叫仙岩的风景值得你专程去看一看。

二

曹村,名字叫村,但又不是一个村,而是一个镇的建制了。

但无论与他比邻的村落怎样逐渐地变成了乡或者镇,曹村还是叫曹村。原因我想只有一个,那就是“曹村”这两个字承载着太多的文化底蕴。

千年之前,在这个小村落里,曾经传过一个喜讯:一个曹姓的学子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功成名就,考取了“进士”。进士并不是官职的名称,只是对一个人在学业上取得成就的认可,我感觉和今天的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差不多。当今的中国早已经没有“进士”了,它只是一个历史

符号,让人们从中提取文化的记忆。

从村里诞生了第一个“进士”始,这里的人们就一直如数家珍地记录着从这个村里走出的“进士”。在记载曹村历史的展馆里,所有进士的名字和画像都被恭敬地挂在墙上,村里的老人们会骄傲地向所有来访者介绍着每一个进士的情况。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掩盖不住的自豪。

墙上的白纸黑字清楚地记载着:这里曾产生过82个进士。

这就是曹村,是号称“中国进士第一村”的所在,村中那高大巍峨的牌楼上就刻着这几个大字。

我是从东北第一次来到温州的瑞安。来之前,我对温州做过一些了解的功课。

用东北话说,“地球人都知道”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先取得辉煌成果的地区。“温州模式”早已被载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史册了。温州人是勤劳的,也是智慧的,走在东北很多的大小城市里,几乎都可以看见温州人的身影,卖眼镜的、做皮鞋的、弹棉花的等等。温州人用自己双手创造着财富,也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树立着自己的朴素形象。

温州无疑在全国都算是一个富庶的地区,当沈阳的房价每平米近8千元就让咱们感叹“太高了,太高了”时,温州到处可见每平米3万元的房价,可谓处变不惊,以阔老富豪的恬静来傲视天下群雄了。曹村所在的瑞安市隶属温州,就属于这样一个富庶的地带。

富,是应该值得肯定的。然而,已经富庶的曹村,向世界炫耀的是什么?不是这个村子里家资达亿元的大款,而是这个曾经出了82个进士的历史,是足以在中国堪称第一的文化。

文化曹村,让我们看到了瑞安的独到雅韵。走进曹村,处处可以看到文化的品牌旗帜,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木版雕刻展馆,原汁原味地保留着曹村在印刷业上为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曹村的人或许背不上郭沫若、闻一多的诗篇,但他们都对《千家诗》中的一首名篇倒背如流:

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



南岳秋韵



cred Wood),才知道什么叫现代派。”他们迫切而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地辩论有时直到深夜,甚至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很难想象,在战争的阴影下,中国现代派诗歌就这样在南岳衡山翻开了新的篇章。

南岳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燕卜苏是第一位来到南岳并且影响巨大的异国文人,这种奇遇促成了《南岳之秋》的横空出世。《南岳之秋》也是燕卜苏一生中最长的诗作,写得从容轻快,全诗娓娓而谈,似乎是与中国同事饮酒聊天,只是思想跳跃极快。“确实,我奔跑,我逃亡,带着希望,带着信任”。说到南岳,“我所住的这座圣山,对于我读叶芝有点关系”。叶芝是他精神的圣山,南岳是大自然的圣山,这两座圣山在他的心目中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面对这座“本身也是神灵”的“佛教的圣山”,他想起了叶芝的诗句:“灵魂记得它的孤独,在许多摇篮中颤抖。”燕卜苏坚信的是,中国将在此摇篮中获得新生。

长沙临大文学院当时可谓人才济济,汇聚了一大批名流雅士,包括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叶公超、沈有鼎、郑秉璜、浦江清、柳无忌、容肇祖、吴达元、孙晓梦、罗岚岚、金岳霖、刘寿民、杨业治、周先庚、吴俊升、罗廷光等,都是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当时,燕卜苏和金岳霖同屋,“四人居室,两位教授将就,谈心,论道,不缺朋友”。但所有这些人,当时都没有燕卜苏的名气大。

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十分罕见的外国人,并為青年诗人们架设了一座通往西方诗歌的桥梁,还因为他好酒贪杯,极端不修边幅,使他成为临大文学院的“一道风景”。据说,有一天下午,该他上课了,学生们在教室里久等他不来,于是两个学生便自告奋勇地上楼去找他,只见他醉倒在

床底下,鼾声如雷,睡得很香。另一次喝醉后,他把眼镜放在皮鞋里,第二天起床时踩碎了一片,只好“半壁江山,坚持抗战”,完全是一副落拓不羁的“诗人风度”。他经常穿着那身灰棕色的西装和一双破旧的皮靴,在淅沥的雨声中,撑着一把油纸伞,踏着泥泞去南岳镇上买酒一醉为快。“一块块污泥巴沾满了他的西装修,裤管皱卷起来好像暴风雨过后拆了绳索的风帆,他毫不在乎,也不换洗,天气晴朗时,一样地穿了来上课”。连南岳的和尚道士、老人孩子都知道,“山上的大学里来了一个邋遢洋人”。

1938年2月,燕卜苏随长沙临大文学院一起离开南岳衡山,搬迁至云南昆明。他后来在西南联大工作到1939年夏才回国,1946年又重返北大讲坛,并一直工作到1951年,成为那个年代最晚离开红色中国的西方人。1952年回到英国后,他进入外省一个较小的学校——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担任英文系主任,直到1971年退休。1974年,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78年,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头衔。1984年4月15日逝世,享年78岁。除了《朦胧的七种类型》,他还著有《田园诗的几种形式》(1935)、《复合词的结构》(1951)、《诗集》(1955)、《密尔顿的上帝》(1961)、《使用传记》(1984)等。他关于中国的诗还有《中国》《中国谣曲》等4首。他在谢菲尔德大学时期的同事、英国现代诗研究专家约翰·哈芬登(John Haffenden)后来为他撰写出版了《威廉·燕卜苏传》,编辑出版了《燕卜苏诗全编》。

“今夜在中国,让我来追念一个人。”这是与燕卜苏同在南岳衡山临大文学院任教的诗人冯至写的一句诗。学者赵毅衡在《燕卜苏:西南联大的传奇教授》一文中说:“20世纪文学,说创作,说理论,无法讨论威廉·燕卜苏。他长期与中国共命运,更为他的生涯平添了传奇色彩。”

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独听蛙。

这首诗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写的,名字叫曹邈。这是曹村最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情了,我们在曹村参观时,村里的老人饶有兴趣地把我们领到一处池塘边,指着那一潭碧水说:“这个地方,就是当年诗人独听蛙的地方哟!”老人的脸上笑着,那个表情像是发现了一座金矿。

中国现在正在加速地进行着现代化建设,在30多年的时间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很多地方,自行车变成小轿车了,家里的土房变成了楼房,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生活水平高了是好事情,可是我们在富了之后还要追求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曹村已经有了自己的回答。曹村的回答我以为应该让全中国听到。在追求富庶的道路上,或者是富了之后,我们永远都不要抛弃的——就是文化。

我对温州瑞安人对文化高瞻远瞩般的认识高度给予极大的钦佩。温州瑞安的党委政府以及文化界在文化建设上有目标,有计划。瑞安市竟然有一个庞大的儿童文学作者队伍,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作家,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编报纸、出刊物、开讨论会,乐此不疲,且成果颇丰。在曾经诞生了彭文席《小马过河》这个经典寓言名篇的土地上,如今又有一大批儿童文学作者在迅速成长着。瑞安儿童文学创作的擎旗者是一个叫冰子的语文老师。他写的寓言屢在各地的报纸杂志上发表,在全国的儿童文学界崭露头角。

正是冰子把我领进了曹村。

我永远也忘不了曹村村史展馆中的那些彩灯。曹村的彩灯堪称一绝,数量多,样式也多——有无骨灯,也有用支架支撑的彩灯。曹村的彩灯布置得也很有创意,展室的四周全是镶的大镜子,镜子是折射光线的,走进灯室,你感觉自己如同置身于灯的海洋,你已经被灯所包围了。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灯不仅仅是节日里悬挂的喜庆之物,灯在曹村,更应该是一种象征,是一种比寓言还要有寓意的文化符号。

人类从远古的洪荒时代一步步蹒跚走来,足迹依稀可见。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野蛮的生存状态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类学会了使用火。保留火种的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火把、火种,而灯笼无疑也是火和光明的象征。没有了灯,没有了光,人类就没有了方向,就不会找到前进的目标,就要永远在黑夜里摸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村保留的就不仅仅是灯了,那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信念和理想,是这个村子赖以生存的靈魂。

曹村,这个在中国的版图上可能比米粒还要小,甚至找都找不到的村落,在市场经济劲风强吹的时代,以自己独特的形象不屈地昂着高傲的头颅。支撑他的是什么?就是五千年泱泱华夏大国的文化。

文化,才是显示一个地区特征的旗帜。曹村拥有82个进士,这历史传承下来的,是今人走向未来的一种激励,更是曹村永远的精神财富。写到这里,我想,全国有数不过来的村、乡、镇、县、市、区,经济建设成果让到处都树起了一座座高楼,可是如果我们问一句,除了这些高楼之外,你的文化在哪里,你还拥有什么呢?

走进曹村,我看到了文化的伟大和富有,更看到了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走出曹村,我思考着脚下的路,还有哪一条是通向文化的,这一条路该怎么去走。